

人口學刊
第 44 期，2012 年 6 月，頁 171-182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No. 44, June 2012, pp. 171-182

亞太地區國際與國內遷移之關聯性探究

黃佳媛* 姜蘭虹** 陳端容***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幹事

**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名譽教授、人口學刊主編

***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人口研究組組長

壹、前言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國家邊界變得模糊，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已不再像過去彼此涇渭分明。近年來，臺灣面臨許多國際遷移的新興問題，例如：大量輸入低技術外籍勞工、1990年代後的婚姻移民、以及與中國經濟整合的人才外流等。面對國際遷移的潮流與多元族群的加入，國際遷移成為臺灣人口研究的重要議題，改寫了臺灣人口的面貌。臺灣政府放寬跨國專業移民及設置移民署，便是國際遷移與人口流動在臺灣備受重視的明證。

有鑑於此，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經費支持，特別邀請在境內與國際遷移研究領域長期深耕的Graeme Hugo教授，來臺參加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與臺灣人口學會於2012年4月27、28日合作舉辦的本年度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大會專題演講人，題目為「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Exploring the Linkages」。期望能借重Hugo教授在人口研究與政策發展的專業經驗，與國內人口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結論與建議可提供政府做為人口遷移問題的政策規劃參考。

Hugo教授為澳洲阿得雷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地理與環境研究學系教授暨澳洲人口與移民研究中心主任。他曾經在2002-2007年獲得ARC Federation Fellow榮譽，並且在2009-2013年獲得ARC Australian Professorial Fellow榮譽，他也是現任澳洲政府永續環境、水利、人口與社區部地理及宜居諮詢委員會（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Demography and Liveability of the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Water, Population and Communities, Australian Government）的主席。由於Hugo教授在國際遷移、人口地理及流動性的傑出研究成果，以及長期在國內外研究機

構擔任領導人的角色，在2012年6月獲得澳洲政府頒發澳大利亞勳章（Offic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Hugo教授至今發表超過三百篇的書籍及學術期刊文章、研討會論文及研究報告，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在2011年邀請他擔任人口學刊的國際編輯顧問。他長期關注人口與移動問題，近年對澳洲移民人口及亞洲地區回流者有深入研究，為澳洲在全球人口遷移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

貳、兩種遷移類型的整合

Hugo教授在2012年臺灣人口學會年會的專題演講內容，主要是探討亞洲與太平洋地區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兩者之間的關係。在他研究亞洲人口流動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之中，他發現不只是流動性的強度增加，複雜度也隨之提高，牽涉到廣泛的族群團體與社會階級，以及不同型態的遷移。在遷移的研究中，人們大多是使用二分法（dichotomy），將不同型態的遷移分類在兩種不同的範疇之中，例如：暫時性或永久性的、自發性或強迫性的、經濟性或非經濟性的、以及國際的或國內的。Hugo教授認為雖然這些二分法都有其意義，也有助於瞭解遷移現象，但是在遷移類型之中，有許多現象是互相交集且重疊，並非能夠一分为二的。然而，研究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的學者是完全分開的，彼此之間也沒有太多的溝通與互動，只有非常少的研究是真正關注這兩種遷移型態的關聯。¹整體而言，Hugo教授認為在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之間，相似之處多於相異之處，而且隨著時間的演變，這兩種遷移類型之間存在著一些聚合現象，因此必須要將這兩種遷移類型進行整合。

1 請參見Zelinsky（1971）、Pryor（1981）、Salt and Kitching（1992）、King（2002）、Skeldon（2006）、以及King and Skeldon（2010）。

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所扮演的角色，是區別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的強大基礎，國際遷移包含了長距離旅行的龐大花費及搬移到另一個不同文化的區域，更常牽涉到的是跨越國家邊界管制及國家主權，這是民族國家的一個基本特色。然而，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所成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使得人們在不同國家間的區域內部行使自由且不受約束的責任義務。在亞洲，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預計在2015年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也將會促成在區域內部某些群體（尤其是高技術性群體）的自由流動性。有些國家彼此有著特殊的關係，像是澳洲與紐西蘭，人們可以自由地在兩國邊界之間穿越移動。另外，對於許多相當大的國家（例如：中國、印度等）而言，跨國的遷移牽涉到長距離與大量花費；然而，對於一些比較小的國家（例如：新加坡）而言，人們可以透過短距離與少量花費就移動到了另一個國家。因此，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並不如同一開始所見，它們之間其實沒有一個相當清楚的切割與區分。

在資料的蒐集上，不論是國際遷移或國內遷移，這兩種型態的遷移資料都是老舊過時的。聯合國曾經在1968年出版國內遷移的人口普查手冊、在1980年出版國際遷移的人口普查手冊，這兩者的資料都超過了三十年之久，Hugo教授認為這些資料確實有更新的必要。而隨著國際遷移的範圍日益增加，有關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的資料，以蒐整合取代目前的分開保存，是非常需要著手進行的。

參、遷移原因的聚合

遷移理論通常將自己定位於國際遷移或國內遷移，Hugo教授卻主張在形成遷移的基本原因中，有許多因素是相似且互相關聯的。例如：婚姻移民等社會因素、核心及邊陲地區等經濟因素、被迫遷移等安全因素、以及氣候變遷等環境因素。以下分別討論這些因素造成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之間的聚合現象。

就社會因素而言，在亞洲的許多國家之中，有著明顯的人口梯度，由於不同原因導致生育率下降，並造成青年人口與老年人口佔了大部分比例。尤其是在臺灣，超低生育率是造成遷移的一個重要因素，這解釋了為何臺灣有這麼大量的婚姻移民。這種情形其實也發生在國家內部的都市與鄉村之間，他再次以中國做為例子：雖然生育率普遍下降，但是在鄉村和都市之間不同的人口結構，解釋了為何中國人口有向都市流動的現象。

就經濟因素而言，國家內部的核心與邊陲區域在勞動市場上有著相當大的差異，例如：機會、收入、薪資水準。有些人認為關於遷移的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僅是針對國際遷移的現象，然而，Hugo教授認為跨國主義所強調的概念，像是循環（circularity）、關聯（linkage）、接觸（contact）、匯款（remittance）等，也與國內遷移有所相關。不論是國家之間或是國家內部，都確實促進了移入地與原居地之間的關聯發展。De Haas（2005, 2007）主張國內遷移的匯款額並沒有像國際遷移一樣大量，而Hugo教授認為影響匯款額的因素通常是與遷移的類型有關，還有回鄉探親的頻率也影響著匯款額。另外，當我們觀察循環遷移（circular migration）的研究，幾乎所有文獻都是來自於國內遷移，只有到非常晚近，循環遷移才出現在國際遷移的文獻之中。人們認為在國際遷移裡所談論的循環遷移是一種新的現象，但是Hugo教授指出，有大量在國內遷移中談論循環遷移的理論性研究早在1960-1970年代就已經完成。對他而言，從國內遷移的文獻來探討當前有關國際循環遷移的相關政策，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就安全因素而言，Hugo教授認為遷移與安全性之間的關聯性，將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做了一個清楚的區分。由於我們對於難民（refugees）有著單獨的國際政體制度，這個政體制度針對因為某些原因對自己生命產生威脅，而被強迫在國際之間逃離的難民，以及在境內被強迫遷徙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也有著清楚地劃分。如此一來，你我都能清楚區分並且定義境內流離失所者與難民。儘管

如此，其中還是有很多聚合之處，尤其是強迫境內流民或國際難民的逃離因素。

就環境因素而言，近年來，有關環境所引起的遷移現象，引起了一些學者的研究興趣，尤其是針對氣候變遷的討論，越來越多人認為環境對於人口流動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目前的研究發現，關於環境所引起的遷移幾乎都是國內性的，僅有非常有限的證據顯示國際遷移是被氣候變遷所推動的。有學者提出在未來的國際遷移都將會被環境變遷的因素所驅使，Hugo教授卻認為這個論述是過分地誇大且不具任何經驗上的證據。但無論如何，他認為氣候變遷與環境因素是否會在國際遷移中成為日益重要的推動原因，還是有待研議的。

肆、相關案例的探討

Ravenstein (1885) 提出逐步式遷移 (stepwise migration)，概念是人民移動數次，且每一次移動都朝向更高等級的都市前進，從鄉村到小鎮、到城市、到大都市等。隨後，英國地理學者Fielding (1992) 談論到電扶梯區域 (escalator region)，是指人們移動到更高的都市等級，其移動方式與逐步式遷移的假設頗為相似。Fielding 觀察英國的現象，人們傾向於從鄉村地區移動到城市地區，再從城市地區移動到倫敦；他並觀察這些國內遷移所造成的影響。在2009年，Hugo教授針對澳洲也做了一些研究，他發現在澳洲有著非常特殊的遷移型態，澳洲人民為了受教育而從家鄉移到該州的主要都市，在完成學業後，他們傾向移動到澳洲較大的主要都市，例如：雪梨或墨爾本。但是，他們時常又從這裡遷移到倫敦、紐約、新加坡、香港等國際都市 (Hugo 2012)。因此，在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之間其實有著非常強大的關聯性。

在亞洲也有相同情況，許多案例顯示，人們會從原居地移動到首都城市，尤其是技術性移民或是勞工移民。人們在國內遷移到過境

區域並且待上一陣子，然後他們再從事國際遷移，這些過境區域很重要，但是學界尚未得知其中的關聯性是什麼。有時候會有替代性遷移（replacement migration）的情況產生，Hugo教授以馬來西亞為例，有越來越多的當地人離開鄉村地區前往城市地區，這在勞動力上產生了一個缺口，尤其是在農業及林業等產業，然後這些缺口就透過國際遷移，由大量的印尼人來填補。因此，這又是一個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之間具有關聯性的案例。

國內遷移是如何與來自海外的回流遷移（return migration）產生關聯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回流遷移在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當中都相當重要，它並且試著整合兩種遷移型態之間的關係。非洲奈及利亞地理學者Mabogunje（1970）針對遷移開發出一套系統性研究取徑（systems approach），這個理論架構在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中都是相同的。Zelinsky（1971）的遷移轉型（mobility transition）奠基在一個經濟發展的描述性模型之上，而Hugo教授認為在許多方面而言，它在有關遷移的研究當中，都可算是最創新的一個理論，而且它確實將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整合到同一個系統當中。

對於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的未來發展，King and Skeldon（2010）提出了幾個重要類型的關鍵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與整體遷移及發展相關，其論述和研究都傾向關注國際遷移。Hugo教授指出，若是這些研究對於貧窮國家有更多的影響，或許我們應該提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政策，我們需要發現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之間存在著何種程度的選擇性差異，雖然當中有部分來自於移入地國家所訂定的遷移政策，但是他認為其中還存在著一些差異，是我們還尚未發現及瞭解的。

伍、結語

國際移民全球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05）提到「三D」對於全球跨國遷移的影響，這三D分別是「人口學」（demography）、「發展」（development）及「民主」（democracy）。Hugo教授指出，自2000年中期起，世界銀行與聯合國針對遷移與發展的關聯性，出版了一系列具有極大影響力與重要性的報告與論述，整個轉變了人們普遍認為遷移會導致人才外流的想法。

有些比較平衡的觀點認為，當人們有好的政府及好的政策，遷移可以為原居地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這個觀點在理論面與政策面都帶來重大的發展。然而，Hugo教授認為這個觀點不能只侷限在國際遷移的討論之中，因為國內遷移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如果有好的政策來加以協助，國內遷移也可以對原居地產生相同的正面影響力。許多研究將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分開討論，他認為這會錯過了在它們之間所擁有的重要關聯性。

但最重要的是，所謂的政策、介入、制訂三贏政策、以及對於原居地與移民者會產生正面結果，這些到底意味著什麼？Hugo教授認為，若我們希望所有的現象都由單一個遷移理論來解釋，這是不可能的。但他認為我們可以在遷移研究領域中，發展出更強而有力的理論架構，或許可以將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整合在一起，使我們對它們更加瞭解。最後，Hugo教授以再次強調全盤考量國際遷移與國內遷移兩者之間的整合，做為他這次專題演講的結語。



圖1 大會主席——臺灣人口學會余清祥理事長



圖2 Graeme Hugo教授演講實況



圖3 參觀訪問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由左至右：人口研究組組長陳端容副教授、中心主任張錦華教授、Graeme Hugo教授、人口學刊主編姜蘭虹名譽教授、中央研究院林季平副研究員、資訊組組長溫在弘助理教授

參考文獻

- De Haas, H. 200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Myths and Fact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6(8): 1269-1284.
- De Haas, H. 2007. *Remittances, Mig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Conceptu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 Fielding, T. 1992. "Mig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South East England as an Escalator Region." *Regional Studies* 26(1): 1-15.
-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5. *Migration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New Directions for Action*. Geneva.
- Hugo, G. J. 2012.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Exploring the Linkages*. Paper presented at 2012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Taiw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April 27-28.
- King, R. 2002. "Towards a New Map of European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8(2): 89-106.
- King, R. and R. Skeldon. 2010. "'Mind the Gap!' Integrat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10): 1619-1646.
- Mabogunje, A. L. 1970. "Systems Approach to a Theory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Geographical Analysis* 2(1): 1-18.
- Pryor, R. 1981.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l Migration Theories." Pp. 110-129 in *Global Trends in Migration*, edited by M. Kritz, C. Keely, and S. Tomasai. New York: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 Ravenstein, E. G. 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48(2): 167-227.

- Salt, J. and R. Kitching. 199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Pp. 148-162 in *Contemporary Migration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A. Champion and A. Fielding. New York: Wiley.
- Skeldon, R. 2006. "Interlinkages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Asian Reg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2(1): 15-30.
- Zelinsky, W. 1971. 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Geographical Review* 61(2): 219-249.